

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(CSSCI) 来源集刊

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

华中学术

Central China Humanities

第18辑

主编 戴建业

2017 / 2
VOL.9 NO.2

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(CSSCI) 来源集刊

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

華中學術

Central China Humanities

第18輯

主編 戴建業

2017 / 2
VOL.9 NO.2

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华中学术(第 18 辑)/戴建业主编. —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 6

ISBN 978-7-5622-7847-4

I. ①华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1985 号

华中学术(第 18 辑)

©戴建业 主编

责任编辑:王中宝

责任校对:肖绪旭

封面设计:罗明波

编辑室:学术出版中心

电话:027-67867792

出版发行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址: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

邮编:430079

电话:027-67863426/3280(发行部)

027-67861321(邮购)

传真:027-67863291

网址:<http://press.ccnu.edu.cn>

电子邮箱:press@mail.ccnu.edu.cn

印刷: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督印:王兴平

字数:329 千字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14.75

版次: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8.00 元

欢迎上网查询、购书

敬告读者:欢迎举报盗版,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-67861321

目 录

【学缘漫忆】(主持人:张三夕)

- 转益多师是汝师 龚 斌 1

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】(主持人:孙文宪)

- “文学的主体性”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 黄念然 13
- 文学批评的功能及其理想类型
——以乔治·斯坦纳为中心 魏天无 26

【古代文学研究】(主持人:汤江浩)

- 论“一鸣惊人”之真名假事与隐语讽谏 曲景毅 34
- 明刊曲本插图的演进历程 石 超 43
- 梁启超的先唐诗歌考论 李 丹 52

【现当代文学研究】(主持人:许祖华)

- 历史进化维度中的民国文论建设 黄 健 61
- 张光年生平与文学活动简编 严 辉 69
- 惊奇美学的生成:苏童短篇小说中的恐怖审美现象 涂 慧 76

【语言学研究】(主持人:刘云)

- 论“到(了)+时间词语”之类格式充当时间分句 匡鹏飞 83
- 微信文本会话的语言风格统计与分析 余一骄 94
- “既然”视点下的“只有”精准条件强推句 张 静 102
- 刑事庭审中被告人的情感表达 叶 芳 111

【汉语方言研究】(主持人:汪国胜)

- 表完成的助词“去”、“罢”在海南岛语言中的分布 张惠英 120
- 汉语方言处置式的标记模式 董秀英 129
- 地域文化与大冶方言词汇 熊 雯 141

华中学术(第 18 辑)

【影视文化与批评】(主持人:李显杰)

“北上”香港影人于当下合拍片中的美学转型	赵卫防 147
论电影叙事“内在故事空间”的主体间性	李显杰 158

【博士生论坛】(主持人:魏天无)

视角多样性与词义多维性	
——基于“走”的个案研究	柴湘露 173
“很+V+数量”与“V+好+数量”	肖 慧 181
抗战时期桂林文化供应社企业组织制度建设研究	宋 泉 189
“开始”与“结束”: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对明清士人认同的建构	骆耀军 197

【读书评论】(主持人:孙文宪)

文化的参照与反思	
——读马特尔特《论美国的文化——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》	张三夕 204
我心目中语言学研究的最高目标	
——读《资中筠自选集——士人风骨》	周光庆 218
《华中学术》来稿注意事项	225

转益多师是汝师

龚 斌

(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上海，200241)

1949年之后的中国，出现过几代知识者。其中最特殊的一代，是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，完整经历“文革”十年动荡，并做过知青的知识者。由于历史的荒谬与残酷，这代人的大学梦被无情粉碎，尔后上山下乡，长时间无书可读，无师可从。等到风雨骤停，得以重获读书的机遇。回首岁月坎坷，青春逝去大半。因此，一旦得到读书的机会，深感来之不易，几乎人人时不我待，废寝忘食。如果再运气好，碰到好老师，请益求教，恰如逢雨露春风。而高等学府中不少老师，也是劫后余生，珍惜重上讲台的机会，以高度的责任心及对事业的热爱，真诚对待学生，专心教学。特殊的学生，劫难之后的教师，共同描绘出一幅1949年之后中国大学动人、和谐的师生关系图。老杜说：“转益多师是汝师。”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，“文革”结束之后的一代知识者，许多人都是“转益多师”，如蜜蜂采百花而酿蜜。在我“文革”之后的求学生涯中，受到不少前辈学者的教诲。其中，南京大学的王气中老师、程千帆老师，复旦大学的王运熙老师，不论为人与学问，都对我产生深刻影响。他们谆谆教诲我，真诚关怀我。我终生感激这三位老师，永远记着他们。

一、先师气中如古鼎

1970年12月，在插队落户两年之后，命运似乎特别垂青于我，让我进了复旦大学，做了第一届工农兵学员。江南名校复旦，名师云集。可是，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革命烈焰正熊熊燃烧，学问精湛的名师被烧得焦头烂额。我们这些深受“革命理论”蛊惑的工农兵学员，狂热地喊着“上大学，管大学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”的口号。名师近在咫尺，我们却批判他们，藐视他们。学术权威则如惊弓之鸟，哪敢传授我们知识？在复旦三年多，我从未有过与名师接触的机会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有时想起在复旦做工农兵学员的经历，会怅恨不已。我们与许多大学问家同处一个校园，政治恶势力却筑起无形的高墙，隔绝彼此，即使相遇也形同陌路。我永远失去了向他们请益的机会。犹身在宝山，却空手而归，能不憾恨终生？

1978年，“文革”结束后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。时代赐予我第二次进大学的难得机遇。由于我的特殊经历，我报考时选择了南京大学。这年的7月12日，我来到南

大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复试。先笔试,后面试。面试老师有三四个,其中有一长者,年纪已有七八十岁,脸盘、骨骼皆粗大,气象浑朴敦厚,慈眉善目,举止徐缓儒雅。不知为什么,我初见这位老先生就备感亲切。六七年前,我在复旦难得见到老先生,偶尔在中文系开大会时见到刘大杰、赵景深等几位老师,彼此根本不可能交流。而现在,时代变了,一位陌生的老先生就在眼前,那样可亲可近。我还紧张什么呢?

面试采用抓阄的形式,题目写在小纸条上,卷起来,摸到纸条就照题回答。我抓到的好像是关于唐诗的题目。我回答问题时,他只是仔细听,并不追问我,脸上始终带着笑意。我自觉面试并不怎么好,不深刻,也少有新意。实在想不到,几个月后老先生成了我的指导老师。他叫王气中,将近八十高龄了。

1978年国庆节刚过,我进了南大,成为“文革”后第一届研究生。10月10日,中国古代文学史专业的指导老师同研究生见面。我又见到了气中师,还有面试时未曾见过的管雄先生。此时,可以从容地认识我的指导老师。气中师大概年近八十,安徽口音,说话语速慢,声音不高,平缓如满河流动的水。举止徐缓亦如言辞,沉稳如山。穿着朴素,初看像个乡下老农。细看才能觉察气局浑朴内敛,自有读书人的气度。犹如古鼎,沉积着岁月的厚重,古朴雅正。

我在南大求学三年,是继复旦做工农兵学员之后的第二次扬帆学海。这次完全不同于往昔。我在复旦时,忙着大批判,“以社会为大课堂”,耗费着宝贵的时光。只有在“开门办学”回到学校时,才从图书馆里借来王逸《楚辞章句》、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、朱熹《楚辞集注》等几本代表性的《楚辞》研究著作。后来又读过几篇研究李白诗的文章以及研究《红楼梦》问题的论文集。中文专业最主要的课程中国文学史、中国文学批评史、中国历史、中国思想史、古代汉语,都未系统学过。二十四史除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等在“文革”中偶然翻过几篇外,几乎未曾过目。文学批评史、哲学史、思想史、语言学,一概不知。在先师气中先生和研究生指导小组老师们的指导下,我抓紧时间研读本专业必读的古代典籍。

我先读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,找来朱熹《诗集传》、余冠英《诗经选》,边读边摘录朱熹和余冠英对每首诗意旨的解释,再了解历代《诗经》研究的部分资料,如《礼记·王制篇》、《孔丛子·巡守篇》、《汉书·食货志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,以及代表性的《诗经》注本。相比《诗经》,我读《楚辞》花费了更多气力,把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招魂》等篇工整地抄在活页纸上,原文用红铅笔画出,下面取王逸、朱熹、王夫之及今人马茂元《楚辞选》等各家研究成果,加以注释。1979年3月,管雄先生讲《历代楚辞研究情况》,我又阅读和摘录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,班固《离骚序》,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,刘熙载《艺概·赋概》,鲁迅《摩罗诗力说》、《汉文学史纲要》,游国恩《楚辞论文集》,何其芳《屈原和他的作品》等论文与专著,最后写成论文《论屈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》。此文写成后,气中师推荐给南大学报。

气中师指导我读书要深思悟解,强调勤于思考,善于发现问题,养成读书时有想法随手记下的习惯。他说:“要特别注意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,注意历史上的某些重要时段对文学的影响。”遵照先师指点,我读中国文学史,概括出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。例如文体的兴起与衰落的原因,民歌对新文体兴起的作用,文学的兴盛是否

同社会的繁荣成正比，文学史同政治史、思想史的关系，五言诗与七言诗的起源和发展，词的起源与发展，人民群众是否是推动文学发展的真正动力，等等。

气中师非常重视中国思想史，以为文学同思想关联最紧密。我读思想史收获颇丰。以前，我读过侯外庐《中国思想通史》、任继愈《中国哲学史》的先秦部分，对诸子百家略有所知。魏晋玄学、佛学，宋明理学，属基本无知。进南大之后，开始读中国佛教史，涉猎过的有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、任继愈《汉唐佛教论集》、吕澂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考》、陈垣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等，而最喜欢汤用彤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。这部书不仅当时读，后来也常常读。二三十年后，我写《慧远法师传》、《鸠摩罗什传》，追溯其因缘，当与读汤先生的名著有关。佛教史最有影响的原典，如《弘明集》、《广弘明集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续高僧传》、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佛祖统纪》，也读过一部分，作过摘录。

气中师多次对我们说，文史哲不分家。于是我读文学史，也读历史。读先秦至唐代历史，主要参考书是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后来读《资治通鉴》，着重关注与思想史、文学史有关的史实，比如周代文化的创造和变迁，战国诸子百家，西汉文景之治，黄老之学，汉武帝独尊儒术，东汉党锢之祸，灵帝开鸿都门学，西晋八王之乱，魏晋玄谈，梁武帝崇佛，唐代宦官，藩镇割据之类。读历史与哲学，对我毕业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影响深远。几十年之后我写《鸠摩罗什传》、《世说新语校释》、《南兰陵萧氏家族文化史稿》，都是文史哲兼顾。学文学若只专注于文学，视野必窄，格局必小，所论必浅。

万丈高楼平地起。当年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课程涵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众多方面，夯实了治学的坚实基础。气中师及研究生指导小组，甚至请经济系老师为我们讲授马克思《资本论》，讲完，老师布置作业。我也读过黑格尔《美学》，但太过艰深，未曾深入。南大天文学系海内独步，中文系请该系卢老师给我们上过好几周古代天文历法的课。1980年10月，由气中师和南京师院徐复先生共同发起，在安徽滁州师院举办古代天文历法讲习会，请张汝舟老先生的弟子讲授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，使我们大开眼界。南大中文系培养研究生既博且精，倡导朴实的优良学风，为我们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深广的基础。为此，我终生感激南京大学，感激气中师和指导小组的老师们。

气中师对中国文学史造诣较深，尤擅长讲授古文辞。1979年下半年至1980年上半年，他讲授唐宋古文，唐以韩愈为主，宋以欧阳修为主。如韩愈《蓝田县丞厅壁记》、《题李生壁》、《贞曜先生墓志铭》、《女挈圉铭》、《送穷文》，欧阳修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、《醉翁亭记》、《丰乐亭记》。气中师细致比较韩、欧两家文章的差异，对古文的作法有独特体会。譬如他分析《蓝田县丞厅壁亭记》说，韩愈追求弦外之音，话讲出来背后还有许多东西，诗的“味”、文的“趣”都表在这里。又说，把诗的写法与文的写法统一起来，以前的古文家都会写诗。分析韩愈《题李生壁》说，这类文章与诗无别。散文有诗味，与诗相通。

写作毕业论文之前，我们的指导老师是气中师和管雄先生。写毕业论文时，气中师是我的指导老师，故与气中师接触更多一些。“文革”后第一届研究生指导老师中，气中师年纪最大。初识先师，觉得他像个有文化的老农民。时间长了，才知他确实出

身农家,年轻时家境贫寒,姊妹兄弟七八人,他是长子,很早就分担一家生活的重担。有一次,先生偶尔谈起解放前在河南大学教书,奔波劳苦。又说他患肺病数年,名医束手,最后竟然痊愈。他还说早先通过熟人,在国民政府的“蒙藏委员会”工作过。他所说零零碎碎,我听着也无多大感触。最近王学昀告诉我,他爸爸解放前在“蒙藏委员会”的经历,解放后成了“历史问题”,每次运动来了都要吃苦头,“文革”中成了“反动证据”,被诬为“国民党特务”,横遭造反派批斗。造反派命令气中师与陈瘦竹先生两人互打对方耳光;又用皮带抽打他,惨无人道。先师批斗回家,从不与家人说,默默忍受红卫兵的武斗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有一次军队提拔干部,找气中师调查南大毕业的一个学生。这个学生是造反派,打过先师。先师在调查人员面前不讲这学生是造反派,只是说,学生在“文革”潮流中身不由己,不必让他们承担责任。先师以德报怨,结果这位造反派提拔成干部,但他从来未谢先师,然先师与人为善,本来就没想到要人谢。

三年之中,记不清上气中师家的次数。先师有时也问我研究生班里的情况。有一两次见到气中师和师母,不由联想到我的父母。之所以有此联想,主要是我的父母与气中师、师母的年纪相仿。再有,气中师和师母也确实对我好。二师兄与师妹,都对我讲过:“王先生对你好。”我不傻,自然也感知了。但我当时还真不明白气中师为什么对我好。我究竟有什么好,而气中师要对我好?近来王学昀告诉我,爸爸曾在家里说:“听说龚斌是个造反派呢!”语气惕然有惊。“文革”中吃过造反派苦头的人,大概都会厌恶造反派。气中师知道我是造反派,难怪会吃惊。我一直承认自己在中学时是个激进的造反派。我不赖,想赖掉历史事实是愚蠢的。至于气中师从哪里得知我是造反派,我不知道。而我从拥护“文革”的造反派,到后来怀疑、不满“文革”,厌恶“四人帮”,轻视“文艺旗手”江青,成了“思想反动”的人物,气中师大概也不知。师门三年,我从未讲起过自己的经历。后来气中师对家人说:“龚斌蛮好嘛。”可能他老人家觉得我不像造反派了。如果当时我仍像造反派,“左”得六亲不认,面目可憎,又不刻苦读书,恐怕先生不会对我好。

进校一年半之后,上完了专业基础课。到了1980年5月,我开始构思毕业论文。以前,我写过各类文章,诗、散文、小说、电影剧本、通讯报道、评论、杂文,还有大批判文章、自我检讨书、申诉书,唯独没有写过学术论文,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正规训练。所以,我对写作毕业论文十分在意。

五月上旬,我去见气中师,谈毕业论文的题目。我对先生说,我准备写汉魏之际的文风演变。先生颌首,说:汉魏之际确实是思想、文风的转折时代,这个题目可以做。我说,我想做一个真正属于文学发展史的题目,不做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。先生说:这个想法好的。不过,这个题目涉及这个时代的政治、思想、文学、士风等许多方面,你要全面摸一摸,工作量很大。我说,我已经做了许多读书笔记。先生想了想又说:文风演变可以改成文学演变,包括诗、赋及各体文章的演变,把刘师培的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再好好读一读。

毕业论文的题目得到先生的首肯,这在我意料之中。先生讲古代文章的演变,多次强调思想史同文学史的紧密联系,也指出过汉末魏初是中国思想、学术、士风发生

重大转折的时期。因此，我读思想史、哲学史、文学史，特别留意汉魏之际。以往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学，大多集中在三曹和建安七子，缺乏宏观审视、纵横交叉的整体把握和阐述。我企图揭示汉魏之际各体文章演变的轨迹和特点，并用当时的政治、思想、士风，以及文学的继承和新变的普遍规律来作出解释。

论文题目得到气中师首肯后，我历二十日而后成毕业论文提纲。月底，我把论文提纲交给先生看。六月初，开始写论文。暑假回家，边读《昭明文选》，边写论文。八月中旬，我写信给先生，汇报写作中碰到的困难与疑问。先生回信说：“前人已经论到的，我要突破；前人没有论到的，我更要阐述……关键还是在于从那些材料中发现新的问题，提出自己的看法。”并说等你回校后我们可以详细研究。九月返校，再请教先生。又历五个月而成论文初稿，大约五万字。抄了半个月，交给先生审读，已经是十月底了。先生审读完论文，提出修改意见。

到了第二年开学，论文改出了第二稿。二月中旬，按先生的意见，又改了一稿。3月中旬，局部修改润色第三稿，删削至三万字。月底，誊清论文。气中师递给我一张纸，纸上写着一段简短的评语，多是鼓励和肯定的话。我意识到，论文在先生那边算是基本通过了，虽然“更深入的发展”还不够。

我进气中师门下三年，游于学，游于艺，也游于景。六朝古都，山河壮丽，胜迹不计其数。那是一部读不完的大书，写满历史风云，写满诗歌和艺术。南京近郊及周边，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引人入胜。记不清有多少回，我徜徉在紫金山麓、秦淮河畔，在孙岗、明陵、石头、栖霞……流连忘返，遐想不已。

记得初次从气中师出游，时在1979年春天。气中师与程千帆先生等几个老师带着我们外出踏青，地点是南郊的牛首山。我们年轻，在山路上脚步轻松，往山顶走去，渐行渐高。气中师年纪最大，不用拐杖，挺直了腰板，脚步很慢，却很坚实。程先生手持拐杖，走了一段，停下来，笑着说：“高山仰止。”于是老师们止步，边谈边看着我们登陟。

1980年10月，气中师带着我们及1979级的莫砺锋、徐有富、张三夕等七八个研究生，乘校车来到安徽宣城的青山，凭吊李白墓。以前我拜谒过当涂采石矶的李白衣冠冢，却不知李白真墓何在。现在看到的李白墓在荒无人烟的田野里，孤零零一座土丘，上面杂草丛生，周围树木全无。站在李白墓前，遐想一位伟大的诗魂，千年孤独，青山无语，而诗名响彻寰宇，却少有人来此凭吊，不禁生出感慨。那天，艳阳当头，气温很高，气中师与我们在大太阳下晒了一个多钟头。过了不久，我写《青山吊李白墓》游记一篇，并送给气中师看。他说：“好啊，连游记都写出来了。”

1981年末毕业离开南大后，我又见过气中师三次。1985年夏天，我携妻儿赴九江开会，归途中停留南京，住进南大南园餐厅。当时餐厅作了临时招待所，拼起来的课桌，铺上竹席，挂着蚊帐。白天气温高达38度，夜里闷热难当。傍晚，年过八十的气中师来南园看望我们，手里拎着一瓶麦乳精。想到天气这么热，老师年纪这么大，从家里跑来看弟子，还送礼物，我与妻都十分感动。1991年，我从山东半岛函授回沪，又在南京停留，去看望气中师。老师留我住宿，问我年岁。我答已44岁了。老师说，我大你一倍。我看气中师腰板挺直，犹如当年模样，以为仁者寿，健康无

虞。不意两年后，即1993年2月，收到大师兄来信，说恩师身患癌症，将不久于人世。当时，我母亲刚故世没几天，突闻老师病危，急匆匆从上海乘火车赶往南大。进了校医院，只见我师孤零零一人躺在病床上，双目紧闭。我走近病床前，低声呼唤老师。老师睁开眼，见了我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怎么来的？”说完又闭上眼，不再说话。我默默地坐在病床对面的椅子上，看着老师强忍病痛，束手无策，心里说：“今世师生之缘将尽矣！”次日，我返回上海。又过了几天，气中师驾鹤西去。一个月之内，先失慈母，又丧恩师，一时间伤痛不已，心灰意冷。南大百年校庆，我见大师兄，问先师墓在何处。他不知其详。最近，问老师女儿王学昀，始知先师墓在牛首山。何日再上牛首山，磕头先师墓前，以蔬果鲜花祭奠之，乃是我有生之年的一个心愿。

二、才情兼胜程千帆

百年名校南京大学，得六朝古都的流风遗韵，名师辈出，其文采风流，毫不逊色于北大和复旦。一个世纪以来，南大中文系留下了许多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的足迹。我生也晚，进南大时，活跃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大师级的人物皆已逝去，但他们的声名仍被弟子们津津乐道。跨过1949年的历史门槛的一代知识者，先是经历十几年的精神绞杀与肉体摧残，最后遭遇“文革”浩劫，纷纷凋零，存者寥寥，且大多已至暮年。“文革”结束了，幸存者重新走上讲台。这些民国培养的学者，竟然如老树生花，生命力非凡。我在复旦读书时，“反动学术权威”正噤若寒蝉，度日如年，我无缘结识他们。我在南大读书，看到了老树生花，格外绚丽多姿，感叹时花新花难与之相比。

程千帆先生晚年在南大，恰如生花之老树，绚丽无比。

千帆先生不是我的指导老师，但南大第一届研究生，实际上都沾溉于他的精湛学问。古典文学专业和古汉语专业的八个研究生，以及许多中青年教师，其实都是他的学生。千帆先生初回南大之时，还来不及做研究生指导老师，但他授课之多，指导學生之认真细致，实乃不是指导老师的指导老师，我们对他无不敬佩。

千帆先生命运多舛，1957年掉进“引蛇出洞”的“阳谋”大罗网，无端戴上右派分子帽子，赶下讲台，养鸡、放牛几近20年。平反后，武汉大学弃良才而不用。千帆先生“奉命退休”，委身穷巷，沦为街道居民。1978年秋，南大校长匡亚明聘请先生来南大中文系任教，此时先生已经65岁了。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里，千帆先生争分夺秒，绽放出灿烂无比的辉煌。我们进南大时，千帆先生也刚回母校，住在南园门口西侧的一栋小楼里，独自一人。我常见有一老者拎着热水瓶进出小楼。然我孤陋寡闻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后来我见大师兄经常去那栋小楼，手里拎着热水瓶。我觉得奇怪，有一天问他怎么回事。他告诉我小楼里住的是程千帆先生。这样我才知晓先生其人，以及他夫人沈祖棻的不幸经历。

自1979年开始，千帆先生接连开讲历代诗选、目录学、校雠学等多门课程，还作过多次讲座。

这年二月始，千帆先生讲“历代诗选”课，主要内容有三：关于抒情诗，古典诗歌的基本特点，八代、唐宋诗发展概要，而以唐宋诗最详。同管雄先生的“中国诗歌理论史”一样，千帆先生的“历代诗选”，系统讲述古诗到唐宋诗的发展历程，使我

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把握了中国诗歌史的整体风貌。

四月，千帆先生作题为“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究”的讲座，重点谈到“文学独特性”问题。他说，研究者应该发现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看法，发掘作家的艺术独特性。他又批评“四人帮”，说他们对文学独特性患有恐惧症，违反艺术规律。谈到古代爱情诗时说，少部分是为明媒正娶的太太写的，大部分是给妓女做的。古代一男多女，所以有时遇到妓女，感情超过正妻。制度是不合理的，感情是真挚的。并举宋代婉约词为例，以为对此不能一概抹杀，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处理。程先生的观点，与“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”完全不同，我听来觉得十分新鲜。他又谈到以怎样的态度来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，提出五点：老实，有钻劲，热爱，谦虚，勇敢。其中解释“勇敢”说，从创作来说要敢于干预生活，从研究来说要勇于突破禁区，要有独特性。禁区来自两方面，一是自己害怕，二是“四人帮”设置的。千帆先生的讲座，富有创见，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的博学以及重返讲台的勇敢。

五月，程先生作题为“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、距离及其类似问题”的讲座，以为唐人边塞诗中的地名不是考据学的问题，而是理论问题。作家有意改变自然和社会真实，并不稀奇。他举例说：歌德谈鲁本斯画，说是一方面很真实，但有的是物体投影，光不是来自一边，而是两边。唐诗中的地名，有的并不符合当时真实，只是为了引起联想。程先生关于唐诗边塞诗中地名的研究，解释了文学创作中虚写同比喻、联想之间的关系，指出艺术不等同于生活真实。这确实不是考据学，而是文学理论。

1980年上半年，我听千帆先生的校勘学、目录学，读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、梁启超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掌握学问的门径及治学的基本方法。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之学，我从未接触过。而这些学问，正是从事文史工作的不可或缺的基础。千帆先生的两门课，把我们领进学术研究的大门，从此我始知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、即类求书这些治学门径和基本方法，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。当时，我在千帆先生的指导下，上南京图书馆作校勘，写校勘记。又读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余嘉锡《目录学发微》、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、汪辟疆《目录学研究》等著作。课上完做作业，我写成《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札记》。先生用红笔仔细批阅，指出引文中的多次错误，严肃地教育我必须认真校对原文，训练学术研究的基本功。我看着先生的批语，觉得脸发热。我把文章改好后，千帆先生主动推荐给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，后来发表在该社主办的《文献》杂志上。我上千帆先生的课，不仅得到知识，同时也学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态度，即认认真真，一丝不苟。更重要的是收获如何为师的品格——严格要求学生，细致批改学生的作业，同时鼓励学生。

1979年下半年，千帆先生开始指导自己的研究生，相继开设校勘学、目录版本学、杜诗研究等课程。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及中文系中青年教师，常去听他的课。千帆先生才情高，又善表达，板书认真，听者无不称心惬意。课间休息，千帆先生坐在讲台后面，往往有人跑过去向他请教问题。先生有问必答，谈笑风生。看到这幅情景，我就觉得千帆先生讲课是艺术，而他对讲台是何等热爱啊。

当时国门初开，大洋彼岸的汉学家开始跨过山海的阻隔，来到中国大陆，进行学术交流。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华裔加拿大汉学家叶嘉莹女士来到南大，作唐宋词

研究的报告，好像是分析晚唐温庭筠的《菩萨蛮》词。叶女士条分缕析，娓娓而谈，体会之深细，见解之精妙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感觉像是清风来自天外，一扫大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陈词滥调。千帆先生坐在下面第一排，与我们一起听，不断颌首微笑，欣赏之情形之于外，甚至几次走上讲台，亲自替叶女士擦黑板。千帆先生热爱学术，欣赏才能之士的性情，给人深刻印象，故我至今不忘。

至于千帆先生的学术造诣，培养人才的卓越成绩，程门弟子有许多回忆文章，用不到我来说。我仅仅以自己的经历，讲述千帆先生给我的影响。我始终认为，事实也是如此，千帆先生对“文革”后南大第一届研究生的指导和帮助，是全面而有成效的。他的作用，并不亚于我们的指导老师。我从他那里不仅学到知识，更学到他身上“时不我待”的勤勉精神。一个年在桑榆的老人，被荒谬的政治谋杀了宝贵的二十年之后，重返讲台，老当益壮，把苦难的经历化作奋然前行的动力，创造出丰硕的学术成果。他的晚年不是衰朽，而是生命力旺盛的创造，是向人生高峰的最后攀登。那是晚霞满天的景象，使我惊奇并喝彩。几十年来，我每每想到千帆先生的晚年，就觉得他是最好的榜样。如今我也垂垂老矣，但一想到千帆先生，就感到不能懒惰停顿，生命不止，攀登永无止境。

1981年12月，毕业离校前两天的晚上，我到千帆先生家里道别。先生拿出一张纸，热情地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，把我引荐给他的老友华东师大徐中玉先生，请徐先生“湔拔”我。

我自离开南大后，20年间局促于海滨。别易会难，再未见过千帆先生。2000年初，我写完《陶渊明传论》一书，想请千帆先生作序。但一想到他年且九十，我又长期未聆听其教诲，现在贸然请他写序，合适吗？踌躇一阵子后，觉得我终究是他的学生，不必太顾虑。到了四月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写信向千帆先生求序。想不到信寄出没几天，就收到先生的序及所附短信。序大概由师母誊写，经先生改过，寥寥数百字，文思清晰，叙事简练有序，短信笔迹劲健若游龙。再三展读千帆先生的序和短札，目光停留在“耳聋目瞶，弥念故交”二句上，那种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温厚诚挚，令我感动不已。遂思及20年前我在南大从气中师、管雄师学，以及亲受千帆先生音旨的情景，几至泪下。与千帆先生书信往复后，我一直想去南大看望他，相思不已，积思成梦。无奈教务缠身，不能成行。后来一想，反正暑假外出开会，途径南京，届时看望他不迟。岂知6月3日，千帆先生驾鹤西去，使我痛失与先生最后一面的机会。后来，我作《师恩绵长》一文，追思千帆先生，寄托感恩之情。

千帆先生成就卓著，我作为一个他曾经教过的普通学生，受惠于他许多，却从未给他做过什么。为此，我不免惭愧和内疚。岁月易逝，千帆先生故世至今，又快近20个年头了。对于我来说，他离开我已将40年了。但他的道德文章及音容笑貌，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，激励我有意义地度过余生。

三、学界君子王运熙

距今40多年前，我在复旦校园里认识王运熙老师。运熙老师当时还不到五十岁，属于中年教师。有一天，我看到在中文系那栋古雅小楼前面的水泥路上，走着一个很

瘦弱的老师，面色略显苍白，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，手里拎着一只极普通的黑色人造革包，步子很慢，目不斜视，一副沉思的样子。因我常去资料室看书，在路上不止一次见到他。假若天气阴沉，他的臂弯里还会挂一把黑洋伞。后来，我问创作专业的老师，我见到的瘦弱老师是谁。他们告诉我，这是王运熙老师，以研究乐府诗出名。

那时，工农兵学员不上古典文学的课，学生也大多对古典文学不感兴趣。在大批判和“开门办学”的年代，我们不需要一个研究乐府诗的专家。所以，我们与运熙老师从未有过接触。但我记得中文系曾安排过运熙老师给我们讲过《文心雕龙》。他是上海金山人，讲着上海腔调的普通话，细声细气，不紧不慢，外地学生想听懂有些困难。再说，有几个学生对深奥的《文心雕龙》感兴趣呢？一间大教室里，下面的学生似听非听，有的说着小话，老师、学生之间毫无沟通。十几年后，我清理复旦求学时的听课笔记，记运熙老师讲课内容的笔记只有一二页。不过，我还是记住了运熙老师的学术专长，头脑中永远留存着初见到他时的清晰印象：一想到他，“文弱书生”四个字就冒出来。

真正接触和了解运熙老师是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。1980年下半年，我的学位论文已经基本完成，接下来考虑邀请校外专家答辩的事。我首先想到邀请复旦中文系的王运熙老师。他的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成果蜚声海内外，对建安文学也有精入研究。我以为邀请他是非常合适的。当我把这想法告诉气中师，征求他意见时，气中师一口答应。再经南大中文系批准，我于3月25日傍晚，从南京抵达复旦。次日上午，找到复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徐俊西老师，说明来意。徐老师说：“没有问题。你找个时间同王老师讲，就说系里同意了。”第二天，我去天目中路拜访运熙老师，并请他看我的论文。他说，我眼睛不好，你读给我听。那时，他的目疾已经很严重了。为了不损伤他的目力，我借了一只“三洋牌”收录机，把三四万字的论文全录了音，再放给他听，足足花费半天时间。他听得很仔细，听完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。

6月25日下午，运熙老师来南京。我们从车站接他，住进南大南园招待所。晚饭后，去招待所看他，他正在整理行李包里的书面材料。我说，王老师路途辛苦，早一点休息。他回答说，几篇论文还要看一下。说完，拿眼药水滴眼睛。我知道他眼有毛病，视力很差，不能长时间看书。但他是个做事极认真、极细致的人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只好看着他滴完眼药水，早早告辞。

在南大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期间，运熙老师要我陪他去拜访气中师、管雄、程千帆、孙望等老先生。他体弱，走路又慢，一家一家登门，费时又费力。可他从不说不累，也看不出有倦意。我不知道他和那些老先生是否都相识。气中师对我讲过，他与运熙老师相识早在1958年，后来就不曾见过面。而千帆先生1957年蒙冤，以后20多年无缘学界，我猜想运熙老师不太可能有与之过从的机会。但他一一谒见前辈学者，嘘寒问暖，若遇故人，谈吐那样的真诚、谦恭。现在，像运熙老师这样待人接物温和煦和的谦谦君子越来越稀见了。

答辩工作完成后，我陪他游览金陵名胜。彼时大不如此时，连出租车也见不到。我陪王老师游南京，自己买票坐公交车。出行虽不便，但不妨碍我们胜游六朝古都。玄武湖、中山陵、明孝陵、栖霞山、莫愁湖……金陵胜迹几乎游遍。两人挤上公共汽

车，运熙老师不管有座无座，基本上闭目养神。我尽量靠近车窗，两眼盯着车窗外，唯恐错过了下客的站头。

中午，便到路边的小饭店充饥。运熙老师大概见我是个穷学生，每次吃饭都坚持由他付钞。他胃口小，吃得很少。我年轻，胃病还未缠上我，饭菜一大半由我扫荡。

早在三月份，我去复旦请运熙老师来南京时，不经意间问了一句：“王老师，南京您去过吗？”王老师答：“没去过。”当时我想，南京没去过，怎么能考证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，写出《六朝乐府与民歌》这本高水准的学术著作？谁知他初游南京，对六朝古都的胜迹十分熟稔，为此我大感奇怪。一天中午，游鸡鸣寺一带，登上古城墙的遗址。时值初夏，玄武湖烟水明媚，湖边垂柳万千，城墙高矗。他向我指点，何处是台城。初游南京，居然能指点古都胜迹。我猜想他一定读过不少有关金陵的地理著作，且了然于心。见到石碑，他常驻足，辨认碑文，能流利地读出来。这也让我佩服。休息时，我有时会向他讨教读书、治学上的问题。记得在玄武湖一处繁茂的紫藤花架下，他对我谈了好久。

6月30日，最后一天陪王老师出游。上午，到鼓楼乘车。车还未到，我问他当代最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有哪些。他首先说是陈寅恪，说他的著作能发人之所未发。寅恪先生著作我虽读过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，其实并未真正了解他非凡的学术成就。后来，我读了寅恪先生的许多史学著作，就是受王老师这次谈话的影响。我又从包里拿出两张白纸，请王老师给我开一份书目。王老师站着，当即写出书目，范围涉及史学史、政治史、思想史、经学史、文学史、目录学、诗话、词话，著作有陈寅恪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《二编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闻一多《神话与诗》、《唐诗杂论》、《乐府诗笺》，余嘉锡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，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，骆名凯《文选学》，周予同《群经概论》，萧涤非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》等将近五十种。我佩服他的记忆力，在这样一种仓促的场合，能不假思索开出长长一串书目。

前几年搬家，我还发现那份书目装在一一只粗糙的信封里。与运熙老师的数日金陵之游，使我获益良多，同时也更具体、更真切地了解了老师的学问和性情。

我在复旦读书时认识运熙老师，也听过他的课。可是，与王老师从未交谈过。邀请他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，使我得到当面向他请益的极好机会。“讽咏遗言，不如亲受音旨。”王老师的著作我读过，受益匪浅。但亲受音旨，耳提面命，得到的教益更觉亲切和难忘。

运熙老师走后约一个多月，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套倪璠的《庾子山集注》。看着书的扉页上“龚斌学弟留念”几个端正秀逸的字，我感动不已。他的心细和真诚，不仅我感激，连我的同窗学友也被感动了。一位师兄对我说：“王先生对你真好！”是的，王老师关怀着我。在南京鼓楼，我说起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状况，表示将来要研究庾信。实在想不到王老师心细如发，回上海后特地买了这套书寄赠我。如此细心关怀后学的老师，在我的求学生涯中并不多见。可惜后来研究陶渊明，那套《庾子山集注》用牛皮纸包着，一直躺在书柜里。真不知道是否还有时日，能深入庾信的堂奥，不辜负运熙老师当年的一片心意？

自来华东师大几十年间，我仍经常得到他的关怀和帮助。南大毕业回到上海头几

年,我看望过运熙老师多次。又多年之后,我与他相遇于复旦校门口。他对我说,你的毕业论文可以再补充内容,成一专著出版。我唯唯。也确实心存此念,但一直忙于其他问题的研究,补充毕业论文的事落空至今。世上许多人、许多事都是空言立志,未了总是空。

1995年,拙著《陶渊明集校笺》书稿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我考虑下来,决定请运熙老师为书名题签。他欣然应诺,很快就寄来了题签数纸,并在信上谈了他对书名的看法,认为改为“校注”可能更合适一些。在感谢他的墨迹之余,对他在学问上的认真精神,又多了一分了解。

大概十年前,我去看望他。言谈中,他指出我的《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》这本书中的一处错误。我在书中引南朝乐府民歌《翳乐》,误以为“人言扬州乐”一句中的“扬州”为隋唐后江北的扬州。运熙老师指出,六朝时的“扬州”,实指京城建业。回家后我翻开他的《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》一文,证实自己确实犯了许多学人常犯的错误。韩愈说,师者乃在于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。运熙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,时时不忘自己的职责。

几十年来,我能经常得到运熙老师的指点和指正。他的学术成果虽都出版于解放后,但他的学问根底成于民国,学术研究也始于民国。他的最著名的作品《六朝乐府与民歌》、《乐府诗论丛》,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就开始写作。他属于从民国走来的著名学者,谦虚、敬业、慎独、深思、求真、远离名利。在他身上可以看到,受民国学风熏陶的学者多具有高贵的气质和纯正的学术风范。我就读过复旦、南大两所著名大学,后来又在一所不算差的大学里教书,见到过、接触过的人不少,但总以为品德高尚、学术精湛,令我尊敬且佩服的学者寥寥。运熙老师自当入寥寥之列。

当今之世,士风败坏,师德不扬。既要学问好,又要人品好,有操守,真诚关怀学生,乐于奖掖后学,德、艺、知、行数者兼备,真正称得上好老师的老师,少之又少。我有时看某一圈子里的人闹哄哄宣扬某某为“著名学者”、“德高望重”、“著作等身”云云,实际名实相距何止千里,常不禁哑然失笑。而运熙老师乃一文弱书生,居闹市却远避尘嚣,偶尔出门则徐步缓行,与人言谈轻声细语,不张扬、不做作,不凌人,真诚谦虚,润物无声,是个少见的忠厚长者,谦谦君子。他终生视名利为尘土,潜心学术数十年如一日,不以物喜,不以物忧,岂非古人所言“有道之人”欤?然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,凡与运熙老师有过交往的人,大概都会感受到他那瘦小身躯里散发出来的宜人的暖意,感受到由平等亲切而产生的敬重,别后又常常会滋生出思念之情。

四、结 语

先师王气中、程千帆先生、王运熙老师,是我求学生涯中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三位学者。我先后在江南两所名校读书,本可以邂逅更多的名师,然而由于时代的荒谬与清贫,命运只安排我与三位好老师有更多的交往。后来我想,一生中能遇见三位好老师,幸已莫大矣。三位老师各具风采,各有境界。气中师如古鼎,他以古文辞授弟子,他的学问与器局,亦如汉唐古文,醇厚浑朴。他性格坚韧,乐天知命,行事舒

缓，对待学生仁厚。这种品格，不仅让我理解两汉古文与韩愈文章的文以载道、醇厚雅正，同时，也让我懂得人生应该处变不惊，居常而待尽。千帆先生的才情使我敬佩，我唯有高山仰止。但他视学术为生命，无比热爱学生的品格，更让我感动。尤其是他的辉煌晚年，如青山夕照，是我学习的最佳榜样。离开南大至今，四十年一瞬间，我也垂垂老矣。每当我读书作文懈怠之时，千帆先生的形象会浮现我眼前。他那历尽艰难后的奋发，激励我挺直人的脊梁，勇敢前行。运熙老师远离名利，为人学，几至炉火纯青的境界，是很不容易达到的。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，三位老师的学问与道德，足够让我学习终生。才情出于天赋，学问难以企及，道德庶几可以仿效万一。

2017年2月16日改定